

疫情期间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邓林园, 王雨晴, 杨雨萌, 周楠, 李蓓蕾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并探究父母焦虑/抑郁影响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内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亲子冲突量表、亲子亲合量表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对1561名初一—高三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5%。(2)父母焦虑、父母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焦虑、青少年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两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亲合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3)父母焦虑/抑郁不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而是通过五条中介路径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通过亲子关系(亲子冲突、亲子亲合)的中介作用,其中亲子冲突的相对作用力比亲子亲合更大;通过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通过亲子关系(亲子冲突、亲子亲合)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父母焦虑/抑郁通过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关键词】 青少年; 焦虑/抑郁; 亲子冲突; 亲子亲合; 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中图分类号: 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6.022

Parental Anxiety/Depression and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Under the COVID-19: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DENG Lin-yuan, WANG Yu-qing, YANG Yu-meng, ZHOU Lan, LI Bei-lei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parental anxiety/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561 teenager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Parent-child Conflict Scale, Parent-child Cohesion Scale, Mobile Phone and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1)The detection rates of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was 16.5%. (2)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pair of the parental anxiety, parental depression, parent-child conflict, teenagers' anxiety, teenagers' depression, as well as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parent-child cohe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ther variables. (3)Parental anxiety/depression did not 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but indirectly affected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through five pathway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hich including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cohesion,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had a greater relative for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enagers' anxiety/depression;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bo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eenagers' anxiety/depression. **Conclusion:** Parental anxiety/depression don't 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but in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through the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eenagers' anxiety/depression.

【Key words】 Teenagers; Anxiety/depression; Parent-child conflict; Parent-child cohesion; 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爆发并蔓延^[1]。为了阻断疫情向校园扩散,2020年2月12日,我国教育部印发《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中小学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并

合理组织学生居家学习^[2]。疫情的蔓延加上需要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学习,使得我国的中小學生除了身体健康受到病毒的威胁外,还面临着由于学习生活质量被打乱而带来的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其中就包括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3,4]。

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是由手机成瘾引申而来的概念,是指个体因无法自控地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而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行为^[5,6],其中手机等电子产品主要包括手机和平板电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1800937),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CNL-ZD1802)

通讯作者:李蓓蕾, E-mail: beileili@bnu.edu.cn

脑。对于青少年来说,居家学习的要求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充分的理由来接触手机等电子产品^[7],包括上网课、与朋友保持线上交流,或进行娱乐,这些都可能会促使他们形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由此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青少年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问题可能被格外凸显和放大。青少年一旦形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他们的身心发展就会受到一系列不良影响^[8,9]。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讨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将来开发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作为青少年的主要养育者,以及在疫情期间与其接触的主要对象,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疫情期间,除了对于疫情的担忧外,青少年的父母可能还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及冲突,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他们可能更容易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10]。一些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的焦虑、抑郁与子女的外化问题相关^[11,12]。而疫情期间,青少年与父母的长时间朝夕相处,可能更会加大父母自身的焦虑/抑郁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探究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降低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发展的消极影响,促进青少年更好地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鲜有研究直接探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关系,但是已有研究证实,父母的焦虑/抑郁可以显著增加子女的反社会行为^[13]、学校不当行为^[14]等外化问题,那么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作为外化问题中的一种,可能也会受到父母焦虑/抑郁的影响。

而这二者除了直接关联外,可能还存在间接作用机制。目前,家庭关系已被证实是父母情绪问题对子女外化问题影响中的重要过程性因素^[15]。情绪安全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认为父母的情绪问题能够通过影响子女感知到的家庭关系进而导致子女外化问题的出现^[15,16]。而亲子关系作为一种具有互动性的重要家庭关系^[17],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以往关于亲子关系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笼统的亲子关系质量或者亲子依恋等单一指标^[15,18]。但是亲子关系是一个多维概念,不仅包括消极的亲子冲突也包含积极的亲子亲合,二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19]。其中,亲子冲突(Parent-Child Conflict)是指父母与子女由于双方在一些日常活动和安排上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对抗状态^[20];亲

子亲合(Parent-Child Cohesion)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21]。基于此,本研究拟同时从这两方面出发探究亲子关系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中的作用。

一方面,父母的焦虑/抑郁可能会通过激发亲子冲突,从而增加青少年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行为。研究表明,抑郁和焦虑的父母往往会对孩子有更高的心理控制^[22],而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强的自主需求,他们会因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而与父母发生冲突^[23]。为了回避这种冲突情境带给自己的消极感受,青少年往往会转向诸如虚拟网络等其他领域来重新获得快乐,而这就会造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24]。另一方面,父母焦虑/抑郁可能会通过降低亲子亲合,从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问题。抑郁和焦虑的父母被发现会更消极且挑剔地看待孩子,他们对孩子会有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和肢体接触^[25,26]。这种亲子之间情感联结的减少,会增加孩子在家庭中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进而导致他们沉浸在手机等电子产品中无法自拔^[27]。由此可见,不管是亲子关系的积极(亲子亲合)还是消极维度(亲子冲突)都可能会成为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中介变量。

除此之外,亲子亲合和亲子冲突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那么这二者在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中的作用是否会存在差异?这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本研究将同时考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比较这两者的相对影响力。

除家庭因素外,个体因素可能也是父母焦虑/抑郁对子女外化问题影响中的重要过程性因素。首先,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焦虑、抑郁情绪可以影响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28,29]。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the Theory of Prim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认为,个体的情绪可以通过原始性、无意识性的模仿-反馈机制来与另一个人的情绪保持同步^[30]。也就是说,当青少年觉察到父母的消极情绪时,会在无意识中对其进行模仿,并在模仿过程中激活其相同情绪活动的神经表达,从而诱发直接的情绪感染^[31]。因此,父母焦虑/抑郁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抑郁,而疫情带来的居家学习和工作模式导致亲子之间更频繁的接触,则可能加强这种影响。

其次,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增加会导致其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一些研究表明,高焦虑、抑郁的个体

会更多地出现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的问题^[32],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作为从网络成瘾、手机成瘾引申而来的成瘾行为,可能同样会受到个体焦虑/抑郁的影响。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Model),个体会为了减轻自身的负性情绪而使用网络来寻求心理补偿,并进一步对网络产生依赖导致更为严重的成瘾行为^[33],即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可以正向预测其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因此,结合以往的实证研究以及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本研究认为青少年焦虑/抑郁作为青少年的个体因素,可以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在父母焦虑/抑郁和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包括单独中介作用,还包括链式中介作用。家庭进程三元模型(Triadic Model of Family Process)指出影响孩子焦虑/抑郁水平的家庭因素主要分为三个水平:父母水平(Parent-Level)、二元关系水平(Dyad-Level)和家庭水平(Family-Level)。这三个水平之间相互联系,且当某一水平存在缺陷或困难时,就会通过影响其他水平,进而导致孩子焦虑/抑郁的出现^[34]。也就是说,存在焦虑/抑郁的父母(父母水平)能够通过影响亲子关系(二元关系水平)从而增加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进而增加其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风险。因此,本研究认为,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父母焦虑/抑郁通过激发亲子冲突或降低亲子亲合,增加青少年焦虑/抑郁,进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综上,本研究期望可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了解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探究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影响,以及家庭因素(亲子关系)、个体因素(青少年焦虑/抑郁)在其中的间接作用机制,并试图明晰亲子关系的积极维度(亲子亲合)和消极维度(亲子冲突)的相对作用大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深圳市某中学初一到高二的学生及其家长作为被试,共回收配对的学生和家长问卷1590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在剔除了明显规律作答以及答案有明显前后矛盾的问卷后,有效学生和家长问卷为1561份,问

卷有效率为98.2%。在所有有效学生问卷中,男生835人(53.5%),女生726人(46.5%);初中二年级860人(55.1%),高中二年级701人(44.9%)。在所有有效家长问卷中,男生家长835人(53.5%),女生家长726人(46.5%);父亲484人(31.0%),母亲1066人(68.3%)。

1.2 工具

1.2.1 抑郁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Zung编制,中文版由王春芳等人修订^[35,36]。共20题,采用4点计分(1-偶尔/无,4-持续),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情绪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青少年和父母群体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7和0.83。

1.2.2 焦虑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Zung编制,中文版由吴文源修订^[37,38]。共20题,采用4点计分(1-偶尔/无,4-持续),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焦虑情绪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青少年和父母群体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8和0.82。

1.2.3 亲子冲突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义和董奇修订^[20]。该量表由中学生填写,共32题,分为亲子冲突频率和亲子冲突强度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又包括父子冲突和母子冲突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亲子冲突水平的指标,分数越高说明亲子冲突频率越高、亲子冲突强度越大。本研究中,亲子冲突频率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亲子冲突强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7。

1.2.4 亲子亲合量表 由张文新等人修订^[39]。该量表由中学生填写,共20题,包括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两个分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亲子亲合水平的指标,分数越高说明亲子之间的亲合度越好。本研究中,父子亲合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母子亲合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1.2.5 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 本研究将Haroran等人根据DSM-V中“网络游戏成瘾诊断标准”编制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量表》^[40]修订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将其中有关“智能手机”的描述改为“手机等电子产品”。该量表由中学生填写,共9题,采用“是”和“否”计分,“是”计为1,“否”计为0。分数越高,代表个体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越严重。总分高于5分则诊断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由于该量表经过修订,因此对其结构效度进行验证,结果为: $\chi^2/df=7.617$, CFI=0.946, GFI=0.946, TLI=0.928, RMSEA=0.065, SRMR=0.036, 拟合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

1.3 研究程序

在征得校方负责人、学生和家长的同意后,遵循自愿的原则,对中学生及其家长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其中,中学生需要填写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亲子亲合量表、亲子冲突量表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家长需要填写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学生平均填写时间约为20分钟,家长平均填写时间约为8分钟。

1.4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20.0和Amos 23.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法分别对青少年和父母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对于青少年,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7个,共解释67.60%的变异,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2.77%,未达到40%的临界值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对于父母,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6个,共解释55.01%的变异,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5.93%,未达到40%的临界值标准,因此也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根据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的标准^[8]对本研究的青少年被试进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分析,发现在1561名青少年中,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者为258名,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5%。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显示,父母焦虑、父母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焦虑、青少年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两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亲合与其他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1561$)

	\bar{X}	s	1	2	3	4	5	6	7
1.父母焦虑	1.55	0.34	1						
2.父母抑郁	1.84	0.40	0.76***	1					
3.亲子冲突	1.50	0.60	0.19***	0.17***	1				
4.亲子亲合	3.05	0.87	-0.06***	-0.10***	-0.16***	1			
5.青少年焦虑	1.75	0.44	0.21***	0.18***	0.36***	-0.13***	1		
6.青少年抑郁	2.12	0.47	0.22***	0.24***	0.32***	-0.24***	0.77***	1	
7.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0.25	0.26	0.12***	0.12***	0.28***	-0.17***	0.22***	0.24***	1

注:*** $P<0.001$;平均值(\bar{X})采用题均分。

2.3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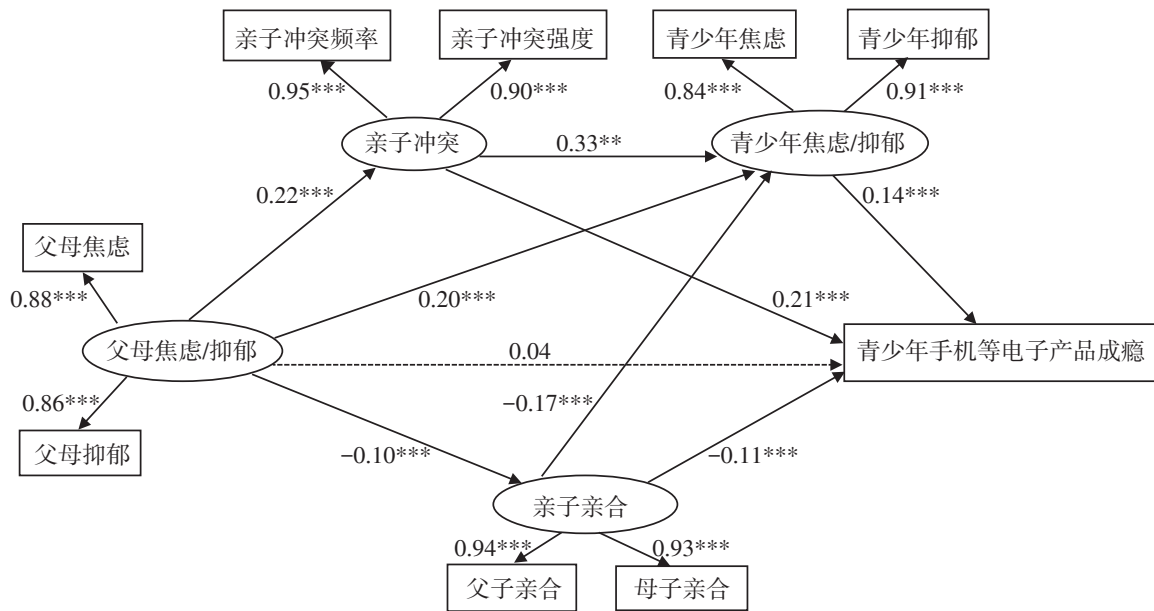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在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假设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chi^2/df=6.421$, CFI=0.987, GFI=0.984, TLI=0.975, RMSEA=0.059, SRMR=0.045)。

中介效应分析(见图1和表2)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在父母焦虑/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7,占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总效应(0.140)的69.29%。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五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这五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其中,通过父母焦虑/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

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1)占总效应比重32.86%;通过父母焦虑/抑郁→亲子亲合→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2)占总效应比重7.86%;通过父母焦虑/抑郁→青少年焦虑/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3)占总效应比重20.00%;通过父母焦虑/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焦虑/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4)占总效应比重7.14%;通过父母焦虑/抑郁→亲子亲合→青少年焦虑/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5)占总效应比重1.43%。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亲子冲突和亲子亲合在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亲子冲突的中介作用效应值要显著高于亲子亲合的中介作

用效应值(95%CI=[-0.015, -0.004])。



注:** $P < 0.01$, *** $P < 0.001$ 。

图1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中介效应

表2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比重	Bootstrap法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1	0.046	32.86%	0.029	0.069
间接效应2	0.011	7.86%	0.003	0.023
间接效应3	0.028	20.00%	0.017	0.045
间接效应4	0.010	7.14%	0.006	0.017
间接效应5	0.002	1.43%	0.001	0.005
总间接效应	0.097	69.29%	0.075	0.12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中学生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5%,此结果与前人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得出的手机成瘾率(12%–23%)相近^[41]。这表明,虽然本研究将平板电脑纳入其中共同探究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但是中学生在这些便携式电子产品上的成瘾率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此结果并不代表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问题是乐观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不能合理且正确地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就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8,9]。因此,对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及其前因变量进行探讨与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

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路径检验的结果均证实亲子关系、青少年和父母焦虑/抑郁会对青少年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产生一定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验证了情绪安全理论^[15]、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30]、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33]和家庭进程三元模型^[34]。

情绪安全理论认为,父母焦虑/抑郁能够通过影响子女感知到的家庭关系进而导致子女外化问题的出现,但以往基于此理论的研究,探讨的家庭关系主要集中在亲子依恋和婚姻关系上^[15],而本研究以亲子关系的两个维度为中介变量进行探讨,并发现父母自身的焦虑/抑郁能够通过增加亲子冲突、降低亲子亲合进而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与丰富。

本研究还发现,父母焦虑/抑郁可以通过增加青少年焦虑/抑郁进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该结果支持了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及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一方面,青少年会在与焦虑和抑郁的父母相处过程中,通过无意识的模仿-反馈机制与父母的情绪保持同步^[31]。另一方面,当青少年存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时,他们会通过沉浸在手机等电子产品中来寻求内心补偿^[33]。

除此之外,根据家庭进程三元模型,父母焦虑/抑郁可以通过影响亲子关系来间接导致青少年产生焦虑/抑郁^[34],进而演变为更为严重的外化问题。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此模型,发现父母焦虑/抑郁越多,亲子冲突越高、亲子亲合越低,而亲子关系的变差会进一步增加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进而导致青少

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本研究还发现消极的亲子关系比积极的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更明显,这说明相较于亲子关系的保护因素,亲子关系的危险因素在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的作用更大。

根据本研究结果,为了更好地减少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发生,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父母应及时对自己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处理。尽管本研究没有发现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直接作用,但父母自身的焦虑抑郁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青少年子女的负面榜样,并且还会通过破坏亲子关系,进而破坏家庭氛围,从而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建立良好亲子关系。本研究发现,增进亲子关系尤其是减少亲子冲突可以有效降低父母焦虑/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家庭中父母应格外注意避免将负面情绪带到对子女的管教以及与子女的沟通中^[22],从而减少与子女的冲突,进而降低他们产生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可能。

第三,改善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焦虑/抑郁是父母焦虑/抑郁和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一结果表明,改善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父母焦虑/抑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在家庭中父母要注意认识和了解青少年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并满足他们真正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青少年选择用沉浸在手机等电子产品这种不健康的方式来变相寻求心理安慰。

第四,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是多方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应当从父母个体因素、家庭互动因素和青少年个体因素多个方面共同入手,才能更好地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参 考 文 献

- Hui DS, Azhar EI, Madani TA, et al. The continuing 2019-nCoV epidemic threat of novel coronaviruses to global health — The latest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Wuh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20, 91: 264–266
- 教育部. 教育部工信部印发通知部署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 (2020-02-12)[2020-8-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2/t20200212_420385.html
- 胡心怡, 陈英和. 大学生疫情压力感知, 心理灵活性对抑郁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4): 739–742
- 姜立君. 新冠病毒疫情下大学生信息焦虑对手机成瘾的影响: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大连大学学报*, 2020, 41(2): 106–110
- Kuss DJ, Billieux J. Technological addictions: Conceptualisation, measurement, etiology and treatment. *Addictive Behaviors*, 2017, 64: 231–233
- 师建国. 手机依赖综合征.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9, 19(2): 138–139
- 常祥文, 陈杨, 李阳阳, 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成瘾行为的影响及防控建议.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20, 29(2): 81–86+92
- 陈春宇, 连帅磊, 杨晨, 等. 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 疲惫感和反刍思维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4): 746–749+745
- Kim SE, Kim JW, Jee YS.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Korea.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15, 4(3): 200–205
- 金家飞, 徐姗, 王艳霞. 角色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抑郁的中美比较——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2014, 46(8): 1144–1160
- 王玲凤, 蔡振春. 父母抑郁体验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2): 177–178+181
- 周婷, 易春丽. 行为抑制性、父母特质焦虑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828–832
- Hautmann C, Eichelberger I, Hanisch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symptoms and child antisocial behaviour: What is specific and is it mediated by paren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15, 39(1): 43–52
- Connors-Burrow NA, Swindle T, Mckelvey L, et al. A little bit of the blues: Low-level symptoms of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lassroom behavior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26(2): 230–244
- Cummings EM, Schermerhorn AC, Keller PS, et al.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ren's representat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child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008, 17(2): 278–305
- Davies PT, Cummings EM.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6(3): 387–411
- 杨逸群, 陈亮, 纪林芹, 等. 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33(3): 368–377
- Staton JY.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internalizing symptomatology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n examination of di-

- 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Dissertations & Theses-Gradworks*, 2014
- 19 Smetana JG, Metzger A, Campione-Barr N. African American late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Developmental transitions and longitudinal patterns.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3): 932-947
 - 20 方晓义, 董奇. 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的亲子冲突. *心理科学*, 1998, (2): 3-5
 - 21 Zhang W, Fuligni AJ. Authority, autonomy,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6, 16(4): 527-537
 - 22 Cummings EM, Keller PS, Davies PT. Towards a family process model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Exploring multiple relations with child and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5, 46(5): 479-489
 - 23 杨菲, 吴鑫德.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初中女生抑郁焦虑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4, 22(9): 1418-1420
 - 24 赵宝宝, 金灿灿, 邹泓. 青少年亲子关系、消极社会适应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3): 353-360
 - 25 Cummings EM, Davies PT. Depressed parent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terpersonal effects and children's functio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 Joiner, J C Coyne. *The interactional nature of depress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299-327
 - 26 Lyons-Ruth K, Lyubchik A, Wolfe R. Parental depression and child attachment: Hostile and helpless profiles of parent and child behavior among families at risk. In: SH Goodman, IH Gotlib. *Children of depressed parents: Mechanisms of risk and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89-120
 - 27 高峰强, 张雪凤, 耿靖宇, 等. 孤独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 安全感与沉浸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7, 7: 53-58
 - 28 Burstein M, Ginsburg GS, Tein J. Parental anxiety and child symptomatology: An examination of additiv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arent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0, 38(7): 897-909
 - 29 Goodman SH, Rouse MH, Connell AM, et al.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11, 14(1): 1-27
 - 30 张奇勇, 卢家楣. 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9): 1596-1604
 - 31 Preston SD, de Waal FBM.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2, 25(1): 1-20
 - 32 Gao T, Li J, Zhang H,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lexithymia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25: 761-766
 - 33 Kardefelt-Winther D.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 31: 351-354
 - 34 Schleider JL, Weisz JR. Family process and youth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 triadic model of etiology and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7, 29(1): 273-301
 - 35 Zung W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65, 12(1): 63-70
 - 36 王春芳, 蔡则环, 徐清. 抑郁自评量表对1340例正常人评定分析.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1986, 12(5): 167-168
 - 37 Zung WW.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 *Psychosomatics*, 1971, 12(6): 371-379
 - 38 吴文源. 焦虑自评量表(SAS). *上海精神医学*, 1990, 2: 44
 - 39 张文新, 王美萍, Andrew F. 青少年的自主期望、对父母权威的态度与亲子冲突和亲合. *心理学报*, 2006, (6): 868-876
 - 40 Haoran M, Hongjian C, Ruining H, et al. Smartphone use motivation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in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martphone use time for various activiti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20, 9(1): 163-174
 - 41 李晓敏, 辛铁钢, 张琳钰, 等. 中学生无聊倾向自我控制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2016, 37(10): 1487-1490

(收稿日期:2020-10-09)